**中国近代史纲要复习题**

1.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p17**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中国的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近代以来，不少善良的人们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作出过努力。他们的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爱国者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而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为之献身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

1.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p46-47**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再次，洋务运动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p71p65**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它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大力整顿社会秩序，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①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从客观上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和市场的。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对于他们的缺点，“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①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

1.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p103**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瞿秋白当时就说：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p126-p129**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①所以，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此路不通。

　　革命者从来是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真是“激流归大海”。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了。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说，中国革命似乎很难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可能。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①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中央）、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错误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①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1.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p166**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1.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p167**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大家庭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p193**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武装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 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植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1.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p199**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结束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二，结束了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第三，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第四， 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始树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扬眉吐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它可以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凝聚和调集全国的力量，以造福于全国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1.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p192-193**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数十百万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多数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1.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进行新探索、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结束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二，结束了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第三，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第四， 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始树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扬眉吐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它可以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凝聚和调集全国的力量，以造福于全国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在它成立的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中国的经济不仅比欧美发达国家落后了两三百年以上，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有人怀疑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说：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经济上打0分。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不能经受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毛泽东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信：“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为了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初步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权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

　　第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确立起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不但在政治上强大有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开展稳定物价的斗争，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物价飞涨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还进行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便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的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

　　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并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和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党和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必须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原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一些曾经对新中国、新政权、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观望态度的人也开始相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

　　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之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在制定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必须解决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问题。根据新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中国由此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时即已建立，并由1949年全国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认。这就是：国家制度—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在中国确立起来了。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方面，通过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民主改革，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和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初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标志，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和前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动摇不得。动摇了，就会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就会天下大乱，人民遭殃。同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完善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变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即社会主义改革，才能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二）在曲折中前进的20年

　　从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首先，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它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保证和根本前提。

　　第二，消灭了剥削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优势，为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其次，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当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其基本状况是：

　　第一，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很不平衡。80%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还是从事手工劳动；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

　　第二，社会的文化发展落后，民主和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国民整体素质不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一经建立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它还处在初创时期，还很不完善，很不巩固，许多具体制度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既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起来说，这2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这20年的艰苦奋斗、曲折探索分不开的。

　　这20年的建设和探索，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上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主要的教训是，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后来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第二，在政治建设方面,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一整套具体制度，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主要的教训是，未能充分做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第三，在文化建设方面,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国防尖端技术、电子技术等领域，依靠集体攻关，在一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主要的教训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阻碍，影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第四，在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并依据这个学说提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基本适合当时情况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主要的教训是，不适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逐渐脱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在一定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第五，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全国执政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考验面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纠正探索中的严重失误，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主要的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一个时期内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后来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20年间，新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并且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是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以致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的成就。这些错误和挫折所提供的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认真地总结和汲取。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创造性地概括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伟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新鲜经验。主要是：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3．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5．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6．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7．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8．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9．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10．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上十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六个必须”，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任务繁重，难度加大，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运用以往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又得到若干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

　　1．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

　　2．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

　　3．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

　　4．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5．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6．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证明了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跨越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第一，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依附性很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独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更没有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计划指导。因此，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开局阶段，就是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体系开始的。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有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到来，在新中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1953年至1980年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施下一阶段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后，又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从1980年到2000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其中，1981年到1990年实施的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任务，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又通过1991年至2000年的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1年到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5%，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元，均高于“十五”计划提出的12.5万亿元和9 400元的预期目标。财政收入由“九五”末的1.34万亿元增加到3.16万亿元，外汇储备2005年末达8 189亿美元。这些成就使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第二，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法律上被进一步确定下来。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一个时期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主遭到践踏，法制遭到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献。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此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进。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方面，在深化行政管理、司法、干部人事等体制（制度）改革方面，在发展基层民主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并逐步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本框架。

　　第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并在各根据地得到普遍施行。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逐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1965年底发展到12万人；专门研究机构从30个发展到1714个。这种发展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许多优秀作品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遭到封杀、摧残。毛泽东在1975年批评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祝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方针。随后，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相继启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

　　第四，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起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主要发展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同时也积极谋求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中国通过香港等渠道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1955年初，还从瑞士订购了5套列车电机设备，开了新中国引进成套设备的先河。然而，这些努力受到美国等国封锁禁运政策的极大限制。1972年2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揭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实际上宣告了美国等国长期以来对华封锁政策的结束。这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倡导改革的同时，推动对外开放形成了崭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先后采取创办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两大举措，初步形成了以经济特区带动沿海重点城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1989年政治风波被平息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一面从容应对这些制裁，一面抓紧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布局。继1988年决定建海南省并在全海南岛范围内创设特区后，1990年决定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这对于推动对外开放跃升到一个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在打破西方国家制裁、战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阶段。2004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利用外国资金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对外开放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中国。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第五，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主权，必须要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从单一军种向现代化合成军种的跨越式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现代化，为实现国防实力的跨越式发展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要服从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思想，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中国重新确立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85年，我国政府作出裁军100万人的决定，以后又多次裁减军队。1993年，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随后提出实现两个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等国防力量，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两大课题，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开拓前进。

　　以上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巨大变化。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的、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这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延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无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

四、基本历史线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同年12月—1951年10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同年10月—1953年7月，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同年冬—1953年春，新解放区分批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1951年底—1952年上半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

　　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制定并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底，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二）1956—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到1966年5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同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同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随后进行反右派斗争。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失误。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召开。随后在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1965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1963—1965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底—1965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9年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发动政变未遂，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同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联合公报》。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组成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的国务院，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同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发生。

　　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三）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同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同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同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9年6月9日，在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

　　同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国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苏联解体。

　　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同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997年6月30日午夜—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

　　同年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9年12月19日子夜—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系统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同年11月11日，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2002年11月8—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胡锦涛在会上阐述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讲话，阐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

　　同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阐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等。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在这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中共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过分析。毛泽东指出，把我们社会的经济称作“新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并且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其主要途径。决议指出，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适应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就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有相应的规定。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开始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为开展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展开，并于1952年基本完成。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到1949年，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水泥的45%，煤炭的33%，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对外贸易等。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 800余家，金融企业2 400余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及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动态观察 正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的性质，因此，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了深入的论证。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作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国家工业化任务的提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5.2%和39.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 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中国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呢？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1952年币值）。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想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特别是要想成为世界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终究还是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已经丧失了。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确立起来的。

　　中国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的。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过，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

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1949年至1952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同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中共中央正是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而改变原先的设想的。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体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起来。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条件 促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主要是：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为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

　　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发展国营工业。因为在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企业的。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是一个大国，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这就是说，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地。而且，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这些工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虽然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技术设备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但为数不多。不能设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自身的独立发展，中国就可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应当说，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要如此，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生产发展本身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更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十来亩，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49年至1952年，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但在1953年至1954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如果以1952年的粮食产量为100，则1953年为101.8，1954年为103.64。这说明，个体经济的潜力是很有限的。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在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全面展开，城市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尽快增产粮食，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供应城市、工矿区的商品粮。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怎么办？出路何在？对这个问题，陈云在1956年4月作过切实而有力的说明。他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西北每亩七八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入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① 这就是说，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来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必要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第三节 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在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953年，新中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1951年就在着手进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计划提要。“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余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没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不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进行这样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开工或竣工。全国城乡呈现出一片建设的繁忙景象。

　　当时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都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的国营企业。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 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 2亿吨增至1.950 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3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4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历程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土改后，互助组（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某种变工互助或某些集体劳动的几户农民的互助小组）很快就在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了。

　　在工业还不能向农村大量提供农用机械的情况下，互助组能不能前进一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不同的认识。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①

　　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样，就限制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并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农业合作化的前期，发展是健康的。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发展到近1 000万个；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从1951年底的2 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 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年夏季，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同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继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之后又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但在报告中，错误地指责由邓子恢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画脚的“小脚女人”，将正常的党内争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尽管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并且需要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提高。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推进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积极进行。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在中共中央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同年春，李维汉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经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确定对私营商业也搞国家资本主义，而不采取单纯“排挤”的方针。这样，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全面地确定下来了。同年9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1/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①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按照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核定的资本家所有的资产，总数为24.2亿元人民币。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资本家先后共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了其原来所有的资产总额。资本家的所得包括：1949年至1955年间的利润13亿元，1955年至1968年的定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又可以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国家还安排他们进行学习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①

四、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了主体地位。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标志。1952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1%，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1.8%，资本主义经济6.9%。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8.7%，占到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1956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2.2%，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这表明，中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共中央原计划用18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由于进展急促，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如前所述，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里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有急于求成的缺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本来应当引导他们搞合作化的，却把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带进了合营企业；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不过，这些问题是属于实际工作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于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农业生产在这期间基本上也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农业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还是增长了4.9%。值得提出的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大大地发展了。仅1956年一年所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即达1.5亿亩，当年受益的达1亿亩。这等于解放前全国所有水利设施的灌溉面积的一半，等于新中国成立后六年中发展的灌溉面积的两倍。当年受灾农田面积达两亿数千万亩，除8 000万亩因毁灭性的灾害失收外，其余都依靠集体的力量大大减轻了灾害。这就是1956年为什么在灾害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农业显著增产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现代化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越过这个阶段的。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 人民公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由此产生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等问题。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成为“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打开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严厉批判反冒进。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后来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被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但是，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很快便严重地泛滥开来。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从这时起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形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 000万人。①

全面进行政策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到农村基层做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7 000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节衣缩食，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施加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1963年至1965年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p238p239**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基本文件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比如，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p267最下面一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

一、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极其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需要中央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随后，会议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失误。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这篇讲话强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及其意义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错误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这些观点，成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表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三、为全面打开新局面创造条件

平反冤、假、错案 在进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真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是拨乱反正期间社会最关注、情况最复杂、成绩最显著的工作之一。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从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桩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贺龙、乌兰夫、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为以往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和纠正。①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许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既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调整国民经济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经过两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80年减少2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平衡。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发展和平外交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经过3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顺利地实现了。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般了解看看就行）p238-284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作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到1995年，中国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举世关注。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五大完成了三大使命：一是确立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十五大闭幕不久，1998年中国遇到了两大考验和挑战。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0.4%。其次是长江、松花江、嫩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应对这两大考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积极的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就业和再就业，是一大社会系统工程。从1990年到2001年，全国从业人员由6.5亿发展到7.3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1998年到2002年6月，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 600多万人，其中有1 700万人实现再就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又一大社会系统工程。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两个确保”、“三条社会保障线”。“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休、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8年到2002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能按时领取生活费；3 000万左右的离休、退休人员补领和及时领取了养老金8 296亿元；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亿，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额270亿元。

　　中国政府从1986年7月10日提交要求恢复世界关税贸易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共担，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共中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趋利避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 51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

　　千禧之年，世纪之交，举国欢庆。只用了半个世纪，中国就从“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两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一些原先发展看好的国家纷纷陷入经济、政治危机，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增强。